

# “底层话语”遮蔽了什么？

## ——重读《那儿》

◎ 李 静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赣南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 内容提要：

2004年《那儿》的发表被视为“底层文学”与“底层话语”形成的标志，“底层话语”在把“工人阶级”重新带回到各种理论和思想争论的中心时，也暴露出无法进入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分化的历史脉络，无法把握市场在破坏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时，也再造了这个阶级的现实。本文正是通过重新解读《那儿》，剖析出“底层话语”如何在“去政治化”的逻辑的主导下，既遮蔽了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建国运动中获得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又无法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和溃败做出内在的历史分析。

### 关键词：

《那儿》、叙事、阶级意识、底层话语

2004年《当代》第5期发表了曹征路的小小说《那儿》，触发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小说直面国企改革过程中中国有资产流失和传统产业工人底层化的社会问题，塑造了一位在改制中反抗“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和空手套白狼”，这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实的工会主席朱卫国的正义形象，为了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朱卫国失败乃至自杀的故事，揭示出中国社会向市场机制转型过程中滋生出来的不平等和私有化的问题。《那儿》的发表被视为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不仅引发了文学内部关于“底层写作”和“新左翼”等重要话题及讨论，促成了“底层话语”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那儿》的出现使得“小说”再次成为作家言说当下、把握现实的方式，文学又一次恢复了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互动，担当起时代变迁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

### 一、“底层文学”与重估“改革之痛”

文学内部那些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叙事提供了某种历史脉络来梳理和把握阶级话语的消失与“底层话语”形成之间的隐秘关联，“底层话语”的出现与发展又把文学放置到了更为深层的价值主张和更为丰富的现实情境中，那些几乎和《那儿》的发表同时出现的、发生在不同领域的学术争论和社会事件同样参与建构

了文学文本的阐释语境，尤其是稍后发生的“郎咸平事件”不仅更为直接地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直观地凸显了出来，而且把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迅速地延伸到对市场及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来；<sup>1</sup>2005年汪晖发表长篇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sup>2</sup>更是在事实层面上把改制过程中中国有资产流失和宏观政策导向之间的关联勾连了出来。正如报告的标题突显了工人的位置，工人在这篇报告中并摆脱了不能“发声”的、匿名的群体的位置，而变成了能够主动对抗不公正的“私有化”的行动主体，于是，报告在深描市场扩张触发的不平等的问题时，也使我们在通裕集团职工失败的抗争中看到了再造阶级的可能性。这些发生在社会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争论、事件都表达出知识和文化上的转向，中国社会开始寻求某种打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识和把握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在这种经济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底层文学”变成了把对抗市场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知识、或者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关联在一起的整体，在建构出重新认识和想象社会转型复杂性的开阔视野时，也为如何把握中国工人阶级的崩溃和再造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可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郎咸平事件”把国有资产私有化设定为90年代改革的核心议题的同时，

用以揭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及其由此而造成的剥削事实的财务数据和理论逻辑,同样建构出工人阶级“底层化”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郎顾之争”、《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那儿》都可视为关于“底层”的“叙事系统”。<sup>3</sup>《那儿》的发表之后,“郎威平事件”,把争论的矛头聚焦于国企改革中的“MBO”(管理层收购)导向,用客观的经济学数据和逻辑把“管理者”利用国家退出形成的“制度真空”进行资产转移的过程和行为“描述”了出来,用以改善和发展生产经营为目的产权改革,变成了企业管理者巧妙而高超的资本运作,根植于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劳动和奉献积累而成的国有资产,在建立市场需要的现代产权机制的过程中,被管理者“合理”地掠夺了。从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对这种批判的集体沉默到随后逐步展开的反驳过程中,国企改革中的私有化和普通企业职工遭遇到的“制度性侵害”被关联在了一起,工人阶级在改制过程中遭遇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质疑产权、市场自发性及其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sup>4</sup>经济学界内部开始形成了另一种与坚持市场和私有化不一样的声音和理论视野,在这种把平等作为价值取向、把在改制过程中失去了主人地位的广大企业职工建构为被剥夺了参股权、从而无法作为和管理者对等的契约主体进入到市场交易中的“弱势群体”的“叙述”中,底层化的中国工人阶级为重审“改革之痛”提供了新的议题和视角的同时,也把“工人阶级”重新带回到了各种知识、话语和思想激烈交锋的中心。这个在“90”年代建立市场机制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标界出了国企改革中的政治维度,如果说反思国企改革由此获得了重新认识和把握正在发生的“大转型”的现实与意义的可能,那么,“中国工人阶级”被重新“发现”就成为观照当下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政治经济学命题。<sup>5</sup>

这样看来,就不能局限在狭义的“审美性”创作或者“纯文学”的框架下来解读和探讨几乎和“郎威平事件”、“左右之争”同时发生的、作为文学事件的《那儿》,以及由此而成形的“底层话语”。这些发生在文学外部的事件、争论以及江苏通裕集团工人的现实抗争和《那儿》的主题与内容之间呈现出的密切关联,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化与再造变成了关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问题探讨”,我们要做的似乎更应该是贴着《那儿》提出的“问题”来追问:“底层叙事”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出现对应着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小说在把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转变为文学叙事时,又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了问题?那些被理论界、知识界用资料、数据和逻辑把握的现实问题进入到《那儿》中,转变成“底层劳动者”直接的生存经验和命运遭际时,《那儿》又呈现出了哪些被各种理论、知识遮蔽了的现实的复杂性,文学的想象和叙事如何溢出“底层话语”建构出来的历史与现实,在它所处的这个古老民族开始创造性的自我转变的历史中?作为参与和想象性的重构活动,《那儿》不仅“讲出”了“底层”的出现和传统阶级共同体崩溃之间的内在关联,更重要的是,当用文学的笔触直面沦落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时,“底层话语”无力讲清楚、说明白却事关工人作

为人的尊严和身份认同的“困惑”和危机,是否包含了新的政治力量崛起的可能性?

“底层话语”的形成重新把“工人阶级”带回了反思改革、批判市场正当性的视野中时,这些被“大厂”“吐出”来的工人,却被再现为被飞速发展的市场“甩”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和被社会和历史放逐的匿名群体。《那儿》中,工人试图通过买入矿机厂的法人股,重新占据工厂主人的位置的行动失败后,朱卫国悲壮地用“杀死自己”证明自己最终的归属,活着的杜月梅无奈地走向了基督教,在宗教的悲悯中完成了抚慰现实创伤的自我救赎……单位制的崩溃使得工人与工厂之间的关系从“制度性依附”变成了契约式的利益关系时,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之上的、被社会主义建国运动锻造出来的阶级意识、主人意识是否也能随着不公正的股权置换的展开而烟消云散呢?小说用朱卫国的死来指认工人对抗市场化过程中的“私有化”和“不公正”的正当性,用调查组介入矿机厂的改制来抚慰现实中工人阶级承担的“转型之痛”时,恰恰也暴露出“底层话语”的无力和空洞——无法进入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和溃败的历史脉络,把握不住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所塑造的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内在危机与新时期“改革者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

缺失了历史纵深感的“底层话语”既不能挖掘出朱卫国反抗行为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和动力,工人的抗争意识被小说中的“底层话语”局限在了利益诉求的层面上。<sup>6</sup>于是,“底层话语”极大地简化市场化过程中造成工人抗争行为的原因和意义时,也失去了认识和把握转型历史中蕴含着的那种复杂和丰富的现实性的能力,在指认市场破坏工人阶级的同时,遮蔽了再造工人阶级的可能——小说没能意识到朱卫国在对抗私有化过程中遭遇到的“代表性”危机的背后是政党政治转型的社会现实,反而没能关注到工人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尊严之间的内在关联,发现不了“制度性依附”之外,工人与工厂之间的那种已经内化为情感的血肉关联——沦落为社会底层的工人自然地保留着对工厂的“亲近”和热爱,工厂有着对普通工人巨大而丰富的情感上的感召力。《那儿》中,管理者往往是与工人对立的、抽象的“他者”,这个面目模糊的“符号化”的群体常常以剥夺工人的物质利益、践踏工人对工厂真挚感情的双重破坏者的形象,发挥着推动故事的发展、呈现下岗工人的生存困境的功能。这种站在工人的角度对“管理者”速描式的勾勒肯定了“制度依附”化约不了的阶级意识的存在,彰显出阶级尊严和政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底层话语”漠视和遮蔽了这种蕴含着阶级意识的“情感碎片”,找不到支撑和肯定工人抗争合法性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在《那儿》中,下岗工人的反抗依然被局限在资本的运作逻辑之下,被动、无奈、消极,失去了在转型社会中重返甚至想象阶级的可能。

## 二、“代表性危机”与重返工人阶级的可能

不论是国企改革下传统工人阶级的崩溃还是全球

资本时代新工人群体的崛起，都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表征。这种巨大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并没有如“大爆炸”和“休克疗法”那样造成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却也触动了主导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基本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既孕育了丰富的可能性，又隐含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过程。当这种复杂性进入到《那儿》中时，那些被“大转型”裹挟进市场机制的人们的情感、意识、生活方式甚至文化表达和行为模式中，还铭刻着依稀可见的阶级共同体的“痕迹”，这些政治和文化的“碎片”和“细部”与市场机制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充满张力的结构在了一起，构成了“底层话语”的斑驳和断裂。“底层话语”作为叙事，确实指涉出了市场和全球资本时代价值的赋予方式和意义的结构方式，然而，这些“碎片”指向的是在克服资本异化过程中把底层劳动者不断地整合进国家主权的历史、政党政治和文化创造，它们的存在又触及和动摇整个“叙事系统”的稳定能力。于是，“底层话语”虽然受到转型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规约，但它的内部包含着不断地回应或溢出这些规约和限定的罅隙和歧异。“底层话语”结构中自我消解的倾向和不确定性，折射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得重返工人阶级的可能变成了重新认识历史、把握时代脉搏的“问题”。

在提及《那儿》的艺术特色时，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小说的“复调叙事”，而曹征路也不讳言，称自己追求的就是“众声喧哗”。<sup>7</sup>曹征路刻意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制造相互间离的效果，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意义，把朱卫国反抗的行动变成了一种可以不停地拷问和质疑的事件。随着朱卫国抗争行动的展开，各种与朱卫国的思想意识互不相容的声音和话语进入到文本的结构中，再出现现实语境的复杂性。正如目光敏锐的学者指出，小说中那个玩世不恭的叙述者“我”其实是一个“来自所谓‘去政治化’年代长大的年青人的视角”，<sup>8</sup>这正说明了“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小舅朱卫国反抗的动力，甚至怀疑他“真的没有一点私心吗？或者因为他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让我不太相信”。<sup>9</sup>这些由朱卫国抗争行动触发的、具有消解阶级认同倾向的声音和话语出现在了阶级共同体的内部，这本身就指认了工人阶级的溃败和分化。当生活在工人新村的人们从对工厂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自由地进入到“市场”谋生时，深埋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痛苦和苦难在“去政治化”的时代，变成了个人不能言说的“秘密”和痛处，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仅是由外在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带来的物质贫困，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有尊严的精神世界的消失。小说中的杜月梅由从前的文艺骨干变成了新时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遭遇，就是这种危机的集中体现。<sup>10</sup>小说中，在“我”的拷问下，朱卫国承认了被杜月梅下岗后的生存困境刺痛，才决意要通过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随着朱卫国抗争行为的逐渐展开，朱卫国并没有成为“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英雄，反而深陷“代表性”危机；在工人眼里，朱卫国成为和腐败的管理者合谋、骗走工人集资款的“工贼”；在上访过程中，朱卫国又被上级主管部门质问连法人资格都没

有，如何能代表矿机厂的3000工人？<sup>11</sup>在事关矿机厂存亡的危机时刻，“工会主席”的身份没有增加工人的信任，积极主动地参与朱卫国动员和组织的反抗行动，工人反而因朱卫国的“工会主席”的身份，表现出了某种冷漠，使朱卫国变成了“孤胆英雄”，陷入了认识上的困惑，“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吗？”<sup>12</sup>尽管后来工人还是选择相信朱卫国，交出房产本准备在朱卫国的领导下“拼了”，但当这种想要通过购买企业股票，重掌工厂所有权的行动失败后，朱卫国只能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的结局，更为深刻地把朱卫国的悲剧指向“代表性”危机。

如果说下岗后杜月梅沦落为“霓虹灯下的哨兵”是沦为“底层”的工人阶级，在承担和消化了国企改制的成本和风险之后，生活陷入难以继之的窘迫的群体处境，那么，为什么朱卫国决定用抗争捍卫矿机厂工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却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和支持，反而陷入了“代表性”危机之中？或者更为有力的问法是为什么经济上的压迫没有自然地转化为下岗工人自觉的阶级意识？值得关注的是，《那儿》的“复调叙事”使朱卫国的抗争动力变得有些含糊性，从而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可以追问下岗工人抗争合法性应建基于何处的可能。在小说叙事者“我”的拷问下，小舅朱卫国反抗的真实动机是爱情，把抗争的动力归结为私人情感本身就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对文本宰制的表征，然而比较含混的是，这种情感在“我”的“去政治化”的眼光中依然顽强地流露出阶级认同的“痕迹”——“那时候的杜月梅还是车间团支书，活泼、快乐，天天还唱着歌——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天也美，地也美，春风惹人醉——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sup>13</sup>唱着《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的“车间团支书”，这是阶级共同体提供给杜月梅用来确认身份认同和生活统一体的表达结构，指向的是政党借助单位制建构出生产和生活统一的整全性的伦理世界。在这个整全的世界中，阶级认同转变成了日常生活，潜在地规定了共同体成员的情感结构，特别是接下来“我”又讲出了朱卫国受到刺激决心反抗的原因，“这个女人从前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单纯，跟在他后面师傅师傅地叫着，咯咯咯地笑着，如今为三十块五十块就能随便跟人睡一下，她没有法子，因为她还是个母亲，她还有一个住在医院里的孩子。可她心里还有尊严，还有向往，她不能让小舅看不起她。这些都让小舅很受伤害，他不能不对这个女人，还有跟这个女人一样的工人负起责任”，<sup>14</sup>关键的是杜月梅“还有尊严，还有向往”，这意味着由阶级共同体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有尊严的生活世界确实存在过，才有杜月梅“太要强”的尊严和“太需要钱”的贫困之间激烈的碰撞，而像杜月梅这样的下岗工人承担了国企改制的风险和成本，这种隐忍和牺牲不但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的退出，劳动者的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被剥夺和击碎了。朱卫国正是从杜月梅的生存困境中意识到了捍卫劳动者尊严的正当性，才决定抗争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朱卫国身边的亲人反对他抗争时，他动用了

“革命家族”的传统和记忆来表达自己的抗争行动的正当性。可见，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尊严政治确保了朱卫国抗争的正当性，可是，为什么朱卫国还会陷入“代表性”危机呢？

小说有意在叙事者、人物和作者之间制造间离的效果，用“众声喧哗”来表达现实的复杂性。小说中除了朱卫国自己的声音之外，还存在着叙事者“我”的声音和作者自己的声音。如前所述，叙事者“我”是一个“来自所谓‘去政治化’年代长大的年青人的视角”，而读者只能通过这种“去政治化”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要在工人阶级已经分化的现实中坚持抗争，而作者曹征路又明确表示“在我国说‘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也许只是一个幻觉，所以小舅的抗争才具有深刻的悲剧基础。曾经有过的阳光明媚的空气也是稀薄的，只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真诚地迷失在概念里”，<sup>15</sup>这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的质疑同样进入到文本中，于是，在《那儿》中出现了戳穿幻想的讽刺，朱卫国在上访时听说新盖工会高楼，天真地以为：“这说明咱工人阶级还是有地位呀，工人还是国家的主人公不是？”，<sup>16</sup>正是叙事者“我”的去政治化视角和作者的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遮蔽了朱卫国阶级意识构成的历史逻辑，抽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内涵，工会主席的社会身份非但没有确保朱卫国放手发动下岗工人对抗不平等的正当性，反而使朱卫国深陷“代表性”危机的悖谬性，凸显出“政党行政化”的现实。

汪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正经历着从“政党政治”转向“后政党政治”，这一转变的显著特征是“政党国家化”。所谓“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sup>17</sup>这也就是说，改革时代的政党与阶级政治的对应关系逐渐弱化，它不再仅仅作为劳工阶级的代言人，而是成为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减弱，而行政组织功能凸显。与此相应，在宪法框架下，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政治规定性逐渐空洞化，转而成为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特定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原本建基于政党政治的阶级尊严，逐渐丧失既有的合法性地位。<sup>18</sup>换言之，“第二次大转型”触发了当代中国主导政治制度的转变，那种将底层劳动者不断地整合进国家主权中的政治过程终止了，才造成了朱卫国面对的“代表性”危机，底层话语中的“去政治化”倾向消解了底层劳动者抗争与尊严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朱卫国的反抗被表达为一种不被时代理解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阶级意识只能以“私人情感”和“革命家族”的回忆进入到底层叙事中。而朱卫国也并未超越技艺超群的“大工匠”的形象，劳动的价值局限于个体化、技术化的自我实现，新启蒙话语中的核心观念潜在地支配着底层叙事，正如曹征路的一位犀利的批判者指出来的“……换言之，他一方面在美学上反对‘新启蒙’，另一方面又在价值上赞同这种个人主义观念。这样来看，底层写作对‘纯文学’的

反驳，远没有它宣称的那样深刻有力，而是不可避免地与之陷入复杂的观念纠葛之中，无法真正找到追查历史真实样貌的认知路径”。<sup>19</sup>

### 三、“底层话语”的双重遮蔽

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到底层话语的内在困境——既无力对中国阶级的形成和崩溃做出真正的历史分析，也不能理解和把握重返工人阶级的可能性。在《那儿》中，工人不仅不相信身为工会主席的朱卫国会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捍卫普通工人的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底层话语缺省了工人对“朱卫国之死”的反应，只是让活着的杜月梅乞灵于宗教的自我救赎，有意地回避底层化的工人阶级即将面临的命运抉择。于是，尽管“底层话语”把被压迫者建构为整体性的社会存在，但是，个人主义话语依然潜在地支配着底层话语，可以看出，在《那儿》中，作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市场扩张触发的社会矛盾以及下岗工人在面对和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形成的鲜活的阶级体验，而是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个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作家往往以人道主义同情和悲悯态度，书写底层民众在苦难生活中的善恶纠葛与人性挣扎。“去政治化”的逻辑消解了“底层话语”把握社会整体矛盾的可能，社会不平等只能被直接呈现为个人不平等，底层化的国企工人在对抗市场扩张中的“私有化”的行动和声音就被遮蔽了，工人只能作为消极被动的“弱势群体”进入到底层叙事中。

虽然“底层话语”把重返工人阶级带回了重新认识和把握“第二次大转型”的中心，指认了工人阶级分化的现实，但高度“去政治化”的逻辑却把工人阶级的溃败和分化指向了僵化了的“党国体制”。《那儿》的工人已经把“工会主席”当成官僚化的“管理者”，而朱卫国在上访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官员最终无视“管理者收购”对工人利益的践踏的现实，其实都透露出作者曹征路把企业衰败、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原因归结于建国时期形成的“党国体制”。这种意识进入到小说的叙事中时，我们发现，并不是由朱卫国直接讲述矿机厂的历史，朱卫国只能在叙述者“我”的转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矿机厂的历史或者说从社会主义建国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的历史，就在“我”的“去政治化”逻辑的宰制下，变成了“……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一的大厂，拥有三千多人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按小舅的说法，除了飞机不能造，他什么都能干。到了八十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时候，厂里要求分出一部分生产能力开发电冰箱（那时海尔小鸭美菱那些牌子连影子都还没有呢），可上级就是不批准，说是要坚持为矿山服务的方向。好，就为矿山服务。那时厂里每年都有电解铜计划，当时市场上电解铜八千多一吨，而计划价才四千多一吨，谁能批到条子谁就能发财，当时倒腾铜的人比苍蝇都多。厂里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自己拉铜杆拉铜线，这样每吨可以卖到两三万，可上级一看又不干了，愣下文件

把厂的拉线车间给砍掉了，眼睁睁看着那些倒爷在厂门口倒卖调拨单。拿到调拨单还不提货，转手又卖给别人，就是活抢啊！小舅说。可领导还要我们维护大局。好，就维护大局。到了九十年代，等人家把市场瓜分完了，原始积累差不多了，领导说你们该下海了，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游泳了。也行，就自己学游泳。谁怕谁啊，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我们厂其实还是能生存的。虽然工人多一点效益差一点，可我们生产的收割机拖拉机还是不错的，农用机械还是有市场的，还是垮不了。好，他看你还不垮，他就给你换领导班子。非把你搞垮不可。他给你换上一帮贪污犯来当领导，看你垮不垮！”<sup>20</sup> 社会主义建国时期政党政治所主导的“党—国互动”的政治整合机制，<sup>21</sup> 在“我”的转述中被简化为取消企业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行政干预”，而市场却在追忆矿机厂历史的过程中，变成了自足的力量，获得了独立于国家和资本的地位。“底层话语”肯定了市场不证自明的合理性，用市场来祛除了社会主义建国运动锻造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是在国家主导的、基于和工人阶级生活的互动的政治过程中获得阶级意识的，在社会主义建国和市场经济间建构起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这样，“底层话语”既遮蔽了传统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又无法解释其分化和溃败的内在原因，只能对底层化的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表达出道义上的同情和愤怒，现实中工人在反抗“私有化”的行动和声音，如汪晖在《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中揭示出来的，用血泪书铸就的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就被这种道德层面的义愤和悲悯淹没了，底层话语再也无力“看到”市场再造工人阶级的可能性，难怪曹征路会说：“一段时间来，国营企业和工人只是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存在着，他们的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作用”。<sup>22</sup>

#### 注释：

- 1 2014年，媒体不断地重提“郎顾之争”，认为“郎顾之争”提出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是改革中不能不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当时的“不争论”使得原本向经济、政治体制纵深延伸的讨论戛然而止。这种为避免过早触及改革核心问题而采取的“不争论”的态度并没有消除论战双方的分歧，反而随着两极化社会的形成，为改革共识的破裂埋下了隐患。这种重看“郎顾之争”的观点不仅肯定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当这种主流媒体发出无论左右，召唤“郎先生”和“顾先生”回来的声音本身就意味了权力话语无法直面“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以及在反抗这种不平等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详见《“郎顾之争”十年祭》，<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106>。
- 2 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3 对于“虚构”和“叙事”之间的关联，学术界已有很多探讨，“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也强调从虚构方式的角度分析历史叙事，相比于用“虚构”解

- 释“叙事”，本文更强调“虚构”反过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叙事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和“底层问题”相关的文本视为相对稳定的“叙事系统”，“虚构”在这里的首要含义不是是虚假或不真实，而是意味着构成“真实”本身、使得被人称为“真实”的东西能够浮现和形成的叙事关系和网络，或者说“虚构”作为真实的前提而存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得益于王钦的论文《“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性建构及其瓦解——以〈中国青年〉的四次问题讨论为中心》，详见其导言《“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性条件与“寓言化叙事”》，可在中国知网上查阅。
- 4 崔之元：《郎顾平现象的深层原因》，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zt/50forum/yanjiu/2008/05/26/101434.shtml>。
  - 5 转型社会学甚至提出了把“工人阶级”带回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心，将研究的重心放置到了生产的过程，试图在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中探讨再造中国工人阶级的可能性，详见沈原《社会转型与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 6 符鹏对于阶级想象和底层话语困境之间的关联，有着详实和具有阐释力的论述，参见他的《阶级想象的危机和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 7 李云雷：《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 8 钟雪萍：《〈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王晴、黄蕾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9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 10 符鹏把杜月梅的形象摆放在1980年由“潘晓讨论”所表征的人生意义危机的脉络中，认为杜月梅的“堕落”是新时期出现的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精神伦理问题的延伸，认为曹征路没有对这种溃败做出历史性分析，而是直接将伦理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最终使道德义愤流于对权力机制的抽象批判。这种把工人阶级的崩溃视为精神事件，置于“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的结构性的历史变动中加以阐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有助于理解有尊严的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和再造工人阶级之间的现实关联，感谢符鹏。详见《阶级想象的危机和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 11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 12 同上。
  - 13 同上。
  - 14 同上。
  - 15 李云雷：《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 16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 17 参见汪晖《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与后政党政治》，《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 18 符鹏：《阶级想象的危机和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 19 同上。
  - 20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 21 本文借鉴了汪晖提出的“党—国”互动的政治整合方式，详见《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22 李云雷：《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